

The Romance of Democracy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民主的浪漫

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

【美】顾德民 著

郑菲 李胜 马惠娟 译 闻雯 校译

海外借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The Romance of Democracy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民主的浪漫

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

【美】顾德民 著

郑菲 李胜 马惠娟 译 闻雯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美)
顾德民著;郑菲,李胜,马惠娟译.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 2018. 2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 The Romance of Democracy Compliant
Defiance in Contemporary Mexico
ISBN 978-7-214-21449-2

I. ①民… II. ①顾… ②郑… ③李… ④马… III.
①民族志—墨西哥 IV. ①K7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6490 号

The Romance of Democracy : Compliant Defiance in Contemporary Mexico by Matthew C.
Gutmann
Copyright © 2002 by Matthew C. Gutman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4-534

书 名 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

著 者	[美]顾德民
责 任 编 辑	陆 扬
责 任 校 对	洪 扬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插页 4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449-2
定 价	5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项目总监 韩 鑫

项目执行 石 路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事关“民主”（代译序）

范 可

何为民主，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除却作为制度的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有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和基本准则之外，关于何为民主，民主的精神为何之类，都是人们试图寻求一致性答案的问题。然而，有趣的是，如果做一个调查，答案可能相差颇大。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民主代表着他们的制度性认同；对于商人而言，民主可以被理解为市场原则；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普罗大众”而言，民主意味的东西就多了。民主提供了抵抗的话语和行动的空间；民主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发牢骚；民主代表着可以上街游行。总之，民主就是自由，就是为权益而战。但是，事实又当如何呢？这种罗曼蒂克的民主想象究竟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我相信，眼前这本顾德民（Matthew Gutmann）教授的力作《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The Romance of Democracy: Compliant Defiance in Contemporary Mexico*）应当能给我们带来某些答案和启迪。正如他在开篇所说的那样，这本书试图揭露的是，民主的多义性（multivalence）是当代世界如此之多的人们使用这一概念，但却导致戏剧性不同结果的原因：“人们对于党派的忠诚和热情掩盖了大批语义学上的罪恶”（p. 4）。

顾德民教授是美国人类学界著名的墨西哥研究和“社会性别”

(gender)研究专家,任教于布朗大学人类学系。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就读中文系,那时正是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时期。而卷入越战不能自拔更使美国政府雪上加霜。顾教授入学的1968年,西方国家左翼学生运动达到鼎盛。受其影响,他也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干将。而在其后不久,国际形势遇上了百年一遇的重大转变。首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其次是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签订和平协议,使美国从越战的漩涡中全身而退。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震动,非洲裔美国人的武装抗暴直接挑战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带来了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推崇。在这样的氛围里,顾教授不能不受到影响。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在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走上职业市场。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才决定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但选择了人类学。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在10多年的工作岁月里,遇到了许多有意义的人和事。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与墨西哥移民接触,练就了流利的西班牙语,导致大学主修的中文退居“二线”,且日渐“淡出”,几乎彻底淡忘。前些年,顾教授担任布朗大学主管外事的副校长一职,经常与中国一些大学有所交流。因为这个机缘,他又重新开始学习汉语,而且在中国找到一个与他长期关注的“社会性别”问题有关的课题——中国大城市里的“相亲角”。目前,该课题正在顺利地进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读到这一课题的成果。

就读研究院之后,他选择的研究课题是“社会性别”。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所研究的是关于男性的社会性别。简单而言,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对性别(sex)的界定。每个文化对于两性的社会期待不会完全一致。一些男性主导的社会,往往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墨西哥社会就是如此。因此,社会对男人有什么刻板印象,对男人有什么样的期待,以及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行为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他所关心的问题。顾教授是一位十分敬业的学者,每日笔耕不辍,这是他能在6年的时间内拿下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原因。他有着雄厚的理论功底,

加上长时间的田野工作,使他与田野里的“他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顾教授立即在美国精英大学——布朗大学人类学系获得教职,并且十分顺利地取得终身教职。迄今为止,顾教授已经出版了专著多部,而且这些著作都是民族志,均有强烈的理论与现实关怀,都跨学科地在拉美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从事过博士论文研究的“田野”往往会伴随一辈子的学术生涯。在许多研究当中,在田野中的经历时时浮现于脑际,成为我们的参照体系和思考的“资源”之一,更何况我们所收集的材料(data)不会一劳永逸地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被遗忘掉。相反,当我们关注起其他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资料对于我们理解新问题也有意义,从而,它们会给我们提供解释新问题的其他途径。另外,我们启动新的课题时也会时常将之设定在旧有的“田野”地域内。到目前为止,顾教授所写的几本书,都与他从事博士论文研究的地点有关。《民主的浪漫》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就是他为博士论文从事田野工作的同一地点——墨西哥城郊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开展的。顾教授是一位具有强烈专业精神的人类学家,总是希望在田野中用研究对象的语言交流,而墨西哥和美墨关系历来是美国社会政界、学界的重要话题。不仅政客们为如何对待墨西哥移民争吵不休,对于墨西哥有关一切的研究也一直在美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现实生活中,墨西哥人在美国社会随处可见。他们大都担任一些季节性的农场工作,如收获季节采摘水果。在美国城市里,他们则担任了大量主流社会人口不屑承担的工作。可能因为这些综合性因素和他个人政治活动的经历,使他选择墨西哥作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

人类学里不乏这样的例子,人类学家往往因“追踪”移民,也随之“移动”到移入地。华琛(James Watson)早年的研究便是如此,为追踪他在香港新界的村民们的移动,他也来到了他们在英国社区。此举,可谓是启动了后来所谓的“多点民族志”。这样的研究状况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

越多。于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在人类学里成为了一个术语,其内涵与其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里有所不同——它不仅指资本、物流,或者其他非人之物,或其他与人“无关”的信息之跨国界,甚至跨洲界的流动,而且更多地指因人口的跨国流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与“症候群”,而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只是这种跨越边界的出发点,或者背景条件。我没有问过顾教授,究竟是否他的研究兴趣经历过这么一个“跨国”的过程,是否因为墨西哥移民引发他对墨西哥蓝领阶层的研究兴趣?总之,我们既不能将这本《民主的浪漫》说成是跨国主义人类学著作,但也不能将“跨国”的元素从这本书中排除出去。美国的民主氛围比墨西哥更有传统,民主制度也比墨西哥完善。因此,在许多墨西哥公众的眼里,民主意味着如同美国人那样,可以自由地批评、发表,自由地结社集会,可以有自己的选票,选举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无论是各级官员,或者议员、总统,凡此种种。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流动经常通过墨西哥蓝领的交谈和话语中表现出来。

另外,美墨之间,人、信息、资本的跨界流动每日都大量地进行。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无论是否加入美国国籍,都与家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问条件,努力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但是,在这样频繁的交往当中,美国无疑会处处成为他们的参照(reference)。这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对许多墨西哥人而言,几乎成为民主的理想类型。作者将书序中的一节命名为“U. S. Empire: Points of Reference And Deference”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如果直译,那就是“美利坚帝国:参照与依从之点”。他不无挖苦地说,我们其实不清楚究竟是美国政治自由的事实,还是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才确保了它在许多墨西哥人心目中的民主制度的标杆地位(p. 7)。

作者在他的叙述中谈及,墨西哥人从1989年代末起,开始揶揄官方政治。对于一边倒的选举政治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六年一任的总统选

举其实如同一个轮流旋转式的独裁专政。在 2000 年的选举中,实际上统治了国家几十年的革命制度党被击败下台。这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上贫穷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水岭事件,是迈向多党民主制的一次和平过渡。作者认为,“如果还不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去学习首都人民对于民主、反抗和能动性的理解,思考他们为建立民主社区的实践与希望以及墨西哥城的普通居民在他们生活中如何运用政治主权,那将是非常遗憾的”(p. 5)。

顾教授对墨西哥的民主进程简单做了回顾。他指出,墨西哥的左翼运动在上个世纪晚期遭遇了波折,许多左派人士不再寄希望于政党,而是对组织社会运动以实现更大的民主化进程寄予厚望。这些期待与大众反抗的浪漫化观点有关联,如同许多人寻求各种社会力量去取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框架的努力。“政治性文化”(Political cultures)和“政治的文化”(cultures of politics)自 20 世纪末起成为了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概念把政治生活分为公共与私人领域,对于理解许多拉美社会寻求从军事独裁转移到民众参与的政府转变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特殊的情境不一定能直接运用于墨西哥,但作者所探索的许多问题都与当时这些国家新兴的政治文化有关,例如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等。鉴于墨西哥特殊的经济状况,作者认为,民族、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链接了经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大范围讨论,也对资源重新分配,亦如世界银行所说的“扶贫”(poverty alleviation),也至关重要。

到了 21 世纪初,评论家用“再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来形容区域间寻求政治目标和转变进程。但是,民主这个词的歧义性依然四处泄露。再谈及“再民主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么些问题:拉美什么时候实现过民主化? 哪些拉美地区的人民过上了他们所珍视的民主生活? 民主看上去、感受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诸如此类。无疑,作者对于墨西哥知识界在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作用上是感到失望的。他们将社会运动

的出现归结为人们针对贫困——这一长期困扰墨西哥问题之表达方式，但是，他们又认为，这些运动还是不足以对根本的、长期的社会变迁产生作用。一些墨西哥知识分子由此认为，社会改弦更张的变革是政党的事情，大众政治应发挥其他作用。作者从这些论说中看出，许多人对民主依然有着早期社会运动的乌托邦想象，即：社会运动能为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提供一剂灵丹妙药(p. 5—6)。很明显，作为一位深具洞识的人类学家和对社会运动有着丰富经验的行动者，作者已经难以接受，社会运动是杜绝不平等的不二之选的激进观点。

然而，尽管如此，墨西哥的知识界究竟是否身体力行呢？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左翼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确是不遗余力地参与到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讨论中来。他们将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组织和领导社会运动以达成国家主权独立，但却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诉求渐行渐远。许多知识分子深陷于全球化、身份认同、民族历史等问题，试图扩展知识的时间与空间的广度。作者指出，“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像追随时尚一样令人遗憾地抛弃了当代政治和权力的关键问题”(p. 7)。顾教授的这一判断对于当今我们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的做派是否也有警醒作用呢？我认为是有。

鉴于美国往往成为墨西哥民主的参照系，作者不得不对此进行批判。他认为，墨西哥政治精英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缠，忘记了究竟何者才是墨西哥所亟需的：“如果对于贫困人口而言，生存才是唯一突显的问题，那么社会精英又如何有闲心浪费在治国方略的议题之上呢”(p. 9)？因此，他认为，真正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是当代墨西哥民众当中的“顺从的反抗”(compliant defiance)：“想要全面地了解其形式与实质，只有通过各种比较各种研究，并利用不同的方法论方可达成，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问一些关于政治顺从和反抗的问题。”(同上揭)对此，作者运用了实践理论中的能动性(agency)概念来阐发。然而，却对能动性做了与众不同的新理解。

作者认为,能动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十分流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挑战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决定论(determinism)的观点。但是,作者援引了人类学家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的话指出,人们在习惯上往往会选择把积极行动者的努力视为能动性,这就把社会行动者限定在一个概念的宿命论里,这么一来,独立能动性的可能性实际上都被排除掉。而“在无依无靠的人民中浪漫化那些政治成功者的倾向,就像是对反抗理论表达了许多空洞的敬意,不幸地造成了研究领域对于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不成功的、对政治无感、或是无意识的人们——缺乏关注与尊重”(p. 10)。换言之,人们所选择的所谓的能动性往往是那些他们所心仪的对象,这些对象可以满足他们所想象中的当地贫穷阶层之期待。

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还是因为许多作者头脑中存在着某种下意识结构,即:一个社会的走向如何是由精英决定的。如果被这样一种结构所束缚,那么,正如赫兹菲尔德和顾德民所批评的那样,自然会罔顾独立能动性。顾德民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将政治热情简化为能动性。作者的这一洞见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我们在讨论能动性的同时,不能忘记还有大量的,外在于我们关于能动性的理想型之外的人和事。“顺从的反抗”所传递的就是在被动性里寻求主动因素的积极意义。这无疑受到了司各特(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weapon of the weak)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在顺从的过程中,墨西哥城贫民区的人们并不只是简单的被动性主体。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墨西哥人民为了实现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也有普选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政治理想、经历了漫长的奋斗过程。然而,诚如作者所言,实现选举权和公民权是一回事,如何使用这些权利去有效地改变世界是另一回事。关于公民权利和如何运用这一权利的问题,在墨西哥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着不同的认识。而民主的缺陷或者充满缺陷的民主形式,往往又被社会精英指责为“流氓民主”、“半吊子民主”。这些指责性的词语表明,“民主的浪漫确实存在,更确切地说,

它存在于政治大众参与的可能性之中”，“这种浪漫存在于引诱民众去相信乌托邦式的承诺，因为他们唯一的政治未来似乎都是一个模样。”（p. 13）墨西哥民众确实有了决定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要理解墨西哥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察和体会政治激情，民主选举毕竟不是他们每日关心的内容，“嵌入”生活中的“政治”才更值得人类学家的关注。各种零散和琐碎的东西都不应忽视。在这些琐碎和零散中穿针引线或许更能理解生活，甚或政治参与的意义。

墨西哥社会的两极分化自然给民主制度的实施带来一些问题。因此，关于社会阶层问题一直是墨西哥人类学家所关怀的，至今缺乏共识的问题。从 1980 年代以来，所谓“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开始流行。该词语避开了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却给墨西哥知识分子的理论方法的创新设置了某种民粹主义的障碍。然而，“大众阶级”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共识，那就是反对将阶级作为魔杖对人们进行分类，并以此来预判人们的社会行为。作者在本书中的立场显然与他本人年轻时所持有的相反，这大概是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沧桑所使然。

纵贯全书，作者试图理解这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每个人都是民主主义者，那民主的伟大之处何在？各种民主类型和派别的人们都将民主吹嘘为人类的目标、现代思想的奇迹以及整个世界的拯救者，但是，民主真的如此伟大吗？第二，对受害者的责备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如果将能动性理解为穷人和无权者对权力的挑战，那也需要更多地了解能动性的对立面是什么。如果从弱者或者失败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困境，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们的过失，就更能坦然地去检验能动性的内涵。这样就能使研究者将责任（responsibility）与责备（reproach）分开来。第三，难道反抗是社会主义的后浪漫替代物？反抗理论和讨论贯穿于苏联东欧解体之后的 1990 年代。柏林墙的倒塌使热衷讨论社会主义目标的行动者和学者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去踪影。那些今天看来是为负面的事例曾经是如此迷人地吸引了众多狂热的追随者。反抗理论在 1990 年代出现

并且流行起来,可视为一种反思和替代。社会运动未必都必须是革命性的,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遍地开花的墨西哥社会运动至今还值得深入思考和辩论。那些因为生存攸关的基本问题(用水、住房、土地等)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给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了自救的机会——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筹措资金,进行抗争。这样的社会运动大多与地方政治和整体社会问题的微观层面相关联。人们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行动往往在人们有关民主的罗曼蒂克想象之外。而这,才是人类学家应当去关心的重要方面。

每年9月16日是墨西哥独立日,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高呼着“墨西哥万岁!孩子们去死吧!”——的口号。这是个顺从的反抗的隐喻。人们在诅咒不顾自己孩子的“父母”(隐喻国家政府),同时生于其中,接受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是墨西哥的一幅图景,但这样情形在其他国家不也普遍存在吗?因此,事关民主未必只是党派政治、选票及其相配套的制度,政治如何嵌入于人们的生活日常,不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吗?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民族志,小说般的叙事令人随着作者的思路前行。阅读间仿佛看到在漫天尘土的墨西哥城蓝领工人居住区的穷街陋巷中,作者向我们徐徐走来;仿佛看到在酒吧昏暗灯光里,“混在”一群墨西哥蓝领中身材魁梧的作者,胡子拉渣、浑身是劲。尽管互为“他者”,但已无内外之分,场景中不时出现的啤酒和龙舌兰酒衬托着这种交融。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赫尔曼·罗森塔尔(Herman Rosenthal),他在我之前很早就发现了中国和乌托邦精神。